

從服從到抵牾：權力關係的現實轉向？

——讀《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

◎ 劉 進

在有關鄉村語境的諸多敘事中，情感和理性是一對難以調和也難以回避的矛盾。或深於情感，將表達立於意氣之上；或直於理性，陷入表達的蒼白之中。《大河》一書的作者——一個「跑龍套」¹的敘事人，把自己設定成為鄉村語境中的聽者而非說者，融情入理於故事表述把平縣山陽鄉長達二十多年（1975至今）的移民上訪及政府擺平過程作了細緻的展現，揭示了當國家與農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後的新時期發生集體上訪這樣的正面遭遇時，權力關係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實踐中運作並發揮作用的。書的題目雖然叫《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但它卻不是一部關於上訪的描述史，而是在解讀圍繞上訪故事所發生的各種利益關係的對壘和權力關係的運動。因此全書，不是靠淒情的哭訴，也不是執理的勸說，而是通過對權力關係和權力技術的深描體現著其研究的價值。

但全書展現給我們的權力關係似乎突破了我們關於權力的傳統認識，弱者不弱，強者難強是全書表達的最強音。是中國社會的權力關係已經在現實中悄然的發生著轉向了嗎？又或這種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常態，曾經發生的一統而治惟命是從的權力關係只是常態中的一個變態呢？我們不妨從頭作一番思考。

一 兩種權力理論

關於權力的研究，當然不能不談到韋伯和社會衝突學派。韋伯認為權力是在一種社會關係裏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而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之上。²達倫多夫則把權力解釋為不顧反對而把某人意志強加於他人的能力。³盧曼進而認為權力是個體為他人決定選擇或降低複雜性的可能性。⁴布勞曾這樣界定權力：權力是個人或群體將其意志強加於他人之上的能力。⁵在這些代表著傳統權力觀的表達中，我們能夠讀出這樣的兩層含義：其一權力是一方作用於另一方的意志並表現為行動的實踐；其二，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一方，在權力的表達上是主動或被動服從。因此，權力在此更多意義上是一種結構的存在。權力關係就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主體之間因為彼此的地位不同在權力關係的格局中分別佔據不同的位置。權力從上而下，由強及弱，權力的運作具有單向性、一致性。顯然這種權力觀誕生於科層制的內部，它強調層級服從和權力的一致性，而不會考慮權力的逆向表達。

但當反思已經成為一種學術思維，在理論界就幾乎沒有孤立的理論體系的存在了。而關於權力的研究也是如此，一種新的關於權力的理論在福柯的研究中逐漸浮現出來。

「權力無處不在，不是因為它包容一切事物，而是因為它來自每個地方」。「權力不是一種制度，不是一種結構，也不是我們被賦予的某種力量；它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社會中一個複雜的策略情境的名稱。」（Foucault, 1980）福柯這一顛覆傳統權力觀的認識，是建立在其對傳統以統治權力為核心的宏觀權力學的解構的基礎之上的。在福柯眼裏，權力是沒有主體歸屬的，它不是純意志的產物，而是一種博弈的情境，他更主張在結構和制度之外來談權力。在其之後的80年代中後期，魏昂德在《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一書中通過對訪談對中國企業科層制內部權力關係的進行了實證研究並提出了「新傳統主義⁶」、「庇護依賴關係網絡」（Andrew G. Walder, 1986），應該說這是對這種新權力觀在中國社會發生的一次實證檢視。不難發現，較之韋伯等人，這裏表達的是一種新的權力觀，權力在此多了一些動態的意義。權力是一種關係、網路和場。這裏淡化了權力的支配與被支配的對立性，而強化了權力的可權宜和相對性。

應星就是在關係和場中來討論權力的。作者把大河移民與國家的各級行政實體之間所演繹的種種權力關係的博弈，通過兩種不同的權力運作譜系表現出來，揭示了新權力觀在中國社會的現實轉向。

下面我們將從背景轉向、權力的層化和權力技術化三個方面來具體解釋應星這本書中所演繹出的權力關係轉向的事實。

二 背景轉向

現在人們把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國家由計劃型的指令式行政向市場型的指導型行政轉換的轉捩點，應星的故事裏所呈現出來的權力關係和權力表達的新轉向幾乎與此同步。

大河事件發端於計劃型的指令式行政時期，在那樣一種舉手投足與中央保持一致，惟上視聽的時期，已被各種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研來磨去的農民已不敢有甚麼想法了。權力所呈現出的支配和被支配關係，完全的主導了社會的每一種行為，權力的行使是不需要考慮物件意志的。所以周長髮在電站佔屋，老婆致殘之後，還懷揣對政府行為的感激與支持；許老師在階級鬥爭的主題話語面前也會低頭認罪，返過自新；地區政府在電站這座「金庫」面前可以對電站遺留問題這座冰山視而不見。所以在這個時期，人們對於權力的認識和應用基本上還是按照韋伯所表達的意識，在權力的被支配端默默的服從著。應星在書中這樣寫到「80年代以前，國家的治理是一種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實行的總體性治理，這種治理以國家對資源的全面壟斷為基礎，以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和『參與式動員』為手段，以從革命走向革命為目標」⁷。

上訪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監督反映機制，開始於建國⁸，但很顯然在建國之初這種機制幾乎成為了底層百姓哭訴舊社會的罪惡的平台，而並沒有成為一種權力的平衡機制。而伴隨著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自此以後的近三十年，老百姓甚至行政的中間層代表們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基本上沒有脫離傳統的域限，以上面所列舉的集中就權力關係格局下的社會事實仍是當時社會的主流。

關注一個事件，不能脫離該事件所發生的宏大社會背景。大河移民上訪的事實，發生在文革後期，而這一時期，國家雖然在整體上還處於文革的混亂之中。但各種撥亂反正的工作卻也開始在中央和地方進行著，而伴隨著文革影響的漸漸退潮，社會上關於平反和呼籲公正的需求也掀起了新一輪的高潮。這樣的背景事實無疑將為移民上訪問題提供了發展甚至擴大的舞

台，而應星所描述出的這種權力關係的轉向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變化下發生的。

三 權力關係的層化——發生於權力內部和權力之間的博弈

福柯說，每一種知識後面都隱藏著權力，權力是一種關係、網路、場。權力是無主體的、非中心化的，權力具有分散性、多元性。雖然難以斷定應星的敘事邏輯受到了福柯的影響，但他卻正是通過對這些關係中的諸多節點之間的權力關係的運作來鋪展故事並進行分析的。

在書中，應星採用過程——事件的分析，國家和社會這些實體性的概念都被還原成為具體的事件和人物。原來被用來作為社會力量分析的各種群體，都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而是一個個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處境、不同的鬥爭策略的個體所組成的層級，而在各層級之間正是各權力關係運作發生的「場域」。原有的理論視野中被用來作為分析單位的國家和社會等結構性因素，在新的理論視野中，被分解成為相互獨立而又彼此關聯活動元素，這些元素的互動關係編織成了一張廣闊的事件之網，人物是網的節點，事件的演進成了網的經緯之線。

應星說，在電站上訪過程中涉及到從消極的農民到積極的農民、從區鄉到地縣一直到省和中央的各個層次，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種相互滲透、被派系結構和實際利益等因素縱橫切割、複雜微妙的互動關係。通過閱讀我們發現，在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有這樣幾個層級的權力關係：

其一，發生於移民與中間層的權力關係，這是本書所揭示的矛盾衝突最尖銳的一層，而其批判的矛頭也就止步於此。在這一層中，處於絕對弱勢的移民卻並非是完全的被支配對象。而移民對於自身利益的爭取正是通過與中間層之間的權力博弈來獲得的，移民甚至可以通過借權⁹來實現對中間層（鄉鎮、縣甚至是區一級）的行為監管；

其二，發生於中間層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往關於權力的研究，基本上是沒有這一層分析的。原因在於在傳統權力觀的影響下，人們對於中間層的權力認識是通過位元列其科層之上的國家而來的。中間層在權力關係中，只是一個權力表達的派出機構，其自身並沒有權力的實質。但應星的分析裏面，我們看到權力關係在這裏卻是豐富多彩的，無論是上對下，還是下對上，都有著不同的策略。特別是在中間層中，處於下層的權力機構會通過操縱移民行為實現其對上層的權力制衡和利益獲得，而上層的權力機構也可以通過對下層的庇護來平息移民的衝擊；

其三，發生於國家與中間層的權力關係。這是一種指導型的關係，在這裏沒有國家的強制，國家通過權力下放，效果檢查和回饋等機制實現著對中間層的領導。而中間層則通過秩序的有序和政績來保證權力的合理性，並有可能會通過一些策略的使用，來爭取國家權力的下放和自身利益的獲取¹⁰；

其四，發生於移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全書的重點是圍繞移民精英和地方政府（從區鄉到縣再到地區）來展開的，所以國家和普通移民在這個故事中只是一個模糊的背影。因此移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沒有在這裏有太多的展現。但並不代表兩者之間沒有權力關係的運作，這裏先引入孫立平所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和應星的一個疑問。孫立平觀察到，中國農村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是：一方面，國家在農村基層的組織結構在新時期經歷了一個不斷渙散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的意志卻在農村也得到了持續的貫徹和基本實現。事實展示出

來的是一種雙重的情景，而這種雙重的情景在本質上卻是相互矛盾的¹¹。應星在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疑問，「遺留問題」作為中國總體性社會控制的「意外後果」，對國家治理產生的影響為甚麼並沒有直接導致國家的瓦解？是甚麼樣獨特的權力技術的運作使國家的治理在遭遇重重困難中仍繼續發揮著作用乃至進一步發育呢？¹²通過閱讀不難發現，在應星關於權力的討論中，國家與移民之間的權力關係不是凝固在有關的正式規則和程式之中，而是存在於有關各方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之中。移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正是通過其他各層與移民的互動得以表現的。

除去上面的四層權力關係以外，當然我們應該補充的是，全書關於移民的表達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的。在這樣一個廣大的全體之中，有因各種利益相互組合而構成的群體。也有因利益分歧，在大群體中分分合合的小群體。這些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也不再局限於家族或宗教的範圍，而是或依託於基層行政，或依託於精英代表。這些不同的群體，在利益中結合又因利益而分離，權力的博弈在這裏集中表現在利益的獲取上。

四 權力技術化

《大河》一書在發行不到半年之後就遭到了封禁，與其對各層級之間權力關係細緻入微的描寫是不無關係的。但很難說這是一本觸及意識形態實質的作品，且不論作者本身是一位元接受過正規學術規範教育的社會科學的學者，單就其寫作內容本身最多也就只是點擊到意識形態的表象。正如有學者這樣評價應星的寫作是「用一把精緻的學術解剖刀，將國家這套意識形態話語的內在肌理細緻地展示出來，顛覆了國家幾十年建構起來的形象。」¹³他觸動了國家的「臉面」。在應星看來，權力的運作是有策略的，而這種策略來自權力雙方長久的你來我往的博弈。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權力是被看作為一種技術，一種弱者的武器技術，一種強者的反制技術。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自下而上的權力運作中，權力的技術化集中表現在對抗和斡旋的技術上。移民為了使國家在千頭萬緒中意識到他們的土地沖刷問題的嚴重性，綜合運用了「說」、「鬧」和「纏」的問題化技術，把移民自身的生存困境和不公遭遇建構為危及社會穩定局面因而是政府無法回避、推諉、拖延和敷衍的緊要問題。移民的代表是為大家所信賴的生產隊長，而不能忘記的是他們也是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的最低端，雖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生產。但一方面，在鄉民與基層政權的交涉中首先就是通過他們得以實現的，而本書中有關於村一級在移民問題上處於超然地位的解釋，正好把生產隊長作為核心推向了上訪的前台，而另一方面他們本身也是問題的受害者，所以在對抗中也有為自身尋取利益的成分。而在移民上訪的組織上，我們可以看到越往後發展，這種組織性就越強，而且鬥爭的技術¹⁴也越高超。在一定程度上，權力成為了他們的策略，而不是他們成為了權力的附庸。

在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中，權力關係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幾乎在每個節點都會亮起紅燈。全書最精妙的地方莫過於對中間層之間權力技術的描寫，在這裏我們更可以看到權力是如何被技術化的。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移民與國家政權衝突最激烈的地方是發生在最基層的鄉鎮一級，下層政府為了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脫身或是獲利，會有意的引導移民行為向其上級發展，而各級政府之間又會在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情況下，對下層政府進行有效的庇護，對移民進行安撫。其一次又一次的「開口子」和逼不得已的「揭蓋子」策略，或疏或導，都是權力策略下的行為。而除此之外，一些行政上的「打時間差」、「相互推諉」則幾乎成為

了行政慣習。而每當移民與中間層的某一級或幾級政府發生權力的博弈時，中間層的其他各級卻並非是完全的指令必行，行動齊一的。甚至在某一層中，不同的決策者也會產生決策上的不一致，而這些又會被處於劣勢的弱者借用，並在新的權力博弈中為自己增加籌碼。

正是在這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權力運作中，弱者步步為營、心思縝密，而強者若即若離、亦恩亦威，進行著權力的博弈、利益的抵牾。

五 關於轉向的思考

權力關係真的轉向了嗎？讀完全書，有一個很強的感受，那就在政府面前，底層的人民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軟弱，弱者似乎掌握了一套捍衛利益的權力武器。權力在自上而下的過程中，也不再一路暢行，利益上的衝突會引發中間層內部的權力的回流。但我們應該想到，無論是甚麼樣的武器，它都是來自上層的賦予，這些鬥爭和博弈永遠只會發生在制度容許的範圍之內。權力關係雖然突破了以往的那種大一統的支配與被支配格局，權力的實質卻沒有發生變化，發生於同方向上權力之間的抵牾不會導致權力自我消解。它或會轉為弱者的武器，但弱者的武器只是強者進行自我修復的工具，它的每一次使用都是權力的自我修復。因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這種雙向的『意外後果』和『非正式技術』儘管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但正是這兩種非正式技術的逐步發育和相互耦合使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這種矛盾中、在重重困難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並從人民公社化時期那種總體性的治理逐漸演化為新時期所適用的『綜合治理』」¹⁵。

科層制自身「發現」不了的問題需要通過移民的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來暴露，通過高層政府的特殊恩澤去解決；而在上訪無法「完結」、問題不斷被再生產出來的時候，又只有重新訴諸科層的力量才能使問題得以解決。上訪先從國家的權力儀式變成農民演出的戲劇、又從戲劇重新成為新的權力運作技術的關鍵所在，也是擺平和上訪的契合之處。因此權力關係究竟有沒有發生轉向？

也許，移民自下而上的上訪只是國家自上而下的權力巨流的一個回流，也正因为如此，上訪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沒有最後結局，同樣這也證實了孫立平的觀察和回答了應星自己的疑問。

註釋

- 1 應星在故事中並沒有淡化自己的身份，而是在關係—事件的節點處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串聯各種片斷的角色。見書p152
- 2 M·韋伯著 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 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p81
- 3 轉引自 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p346
- 4 轉引自 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p157
- 5 P·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 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p140—142
- 6 個人認為「新傳統主義」與《大河》一書中提到的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分離是有相同的內涵的。
- 7 見書p148
- 8 上訪發端於土改時期的訴苦術，建國後被作為一種制度性的自下而上的反映機制

- 9 這裏的借權是有幾層含義的：其一越級上訪所造成的中間層行為上的被動；其二精英可以通過其對一些上級檔的解讀來實現其對中間層的行為進行利益上的抗爭，如書中移民就充分利用了宋陽旭書記的言論以及兩個字據的取證來爭取自己在補償問題上的主動；其三：日常權威的成分，下3組在許多行動中都多多少少涉及到其與鄉鎮主要領導的關係連接
- 10 「釣魚行動」正是這種策略的一種表現
- 11 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中國農村中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鷺江出版社，2000年
- 12 見書p18註腳部分
- 13 尹鈞 〈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評《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5年6月號
- 14 在書中引用了一句移民的順口溜「中央是恩人，省裏是親人，地區有好人，縣裏多壞人，鄉鎮盡敵人」。從這裏可以看到移民對於各級政府的認同是不一樣的，而在鬥爭中他們也會根據不同的認同採取不同的策略，而在許老師作為軍師指導下的移民八組，在鬥爭策略上對中間層進行了有效的切割，這是移民與中間層權力運作技術化的一個突出標誌。
- 15 見書p142

劉 進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心理學，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分析，人情、面子與關係網研究等。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 2006年4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2006年4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